

5

1992

李 辉 理性透视下的人格
李公明 怀着期望前行
郁 之 大书小识又四则
陈平原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
盛 洪 高尚的帕累托佳境
辛丰年 人如其乐吗？
亦 陶 儒家：最后的民主障碍？

DUSHU

读书



1870



买 颂

陈四益文 丁聪画

石门令朱町无善政而好邀名，出费买颂。东乡之德政碑，南乡之万民伞，西乡之颂德匾，皆以银半千收之。闻巡按将至，又以半千银买嘱北乡之人。

巡按至，北乡人之四乡颂令之德。巡按闻，颇器之。明日，有报四乡之民痛骂朱町，邀名好货，虐政害民。巡按大异之。捉数民至，亲询其故，曰：“何昨颂其德，而今皆非之？”民曰：“昨系买嘱之口，不得不然。今是自家之口，宜乎直言无忌也。”

巡按叹曰：“实至名归，不邀自至。善名、恶名皆如是。”



梓 樗

陈四益文 丁聪画

樗骄梓曰：“吾大本臃肿。不中绳墨；小枝卷曲，不中规矩。以之为栋梁不可，为桁柱不可，为桌为椅为几为凳亦不可。是以匠人不顾，斧锯不加于身，岂若子之旦旦有厄哉！”

梓曰：“不然。吾干直而叶茂，质轻而耐朽。用之为柱，柱坚而直；用之为琴，金声玉振；用之入药，可以清热解毒，疗疮疥。即不之用，亦为荫数丈。是以人培育之，呵护之，故里名之梓里，工匠名之梓人。即或斧锯加身，而器物犹存，是吾名与身皆不朽也。岂若子之空生于世哉。况有用之才，人皆惜之，无用之物，人皆弃之。吾恐子祸不远矣。”

樗不之信，哂笑而已。

未几，匠人至。见樗臃肿盘踞，曰：“此无用之弃物碍吾梓儿。”斫之，锯之。樗哀号倒地，不复以无用骄人。

读书

1992.5

五月十日出版

-
- | | | |
|----|-----------|-----|
| 3 | 理性透视下的人格 | 李 辉 |
| 10 | 见血见肉，方为真实 | 蓝棣之 |
| 17 | 多彩的鉴赏 | 唐 湜 |
-
- | | | |
|----|---------|-----|
| 22 | 怀着期望前行 | 李公明 |
| 31 | 《魔山》的座标 | 易 丹 |
-
- | | | |
|----|---------|-----|
| 38 | 大书小识又四则 | 郁 之 |
|----|---------|-----|
-
- | | | |
|----|-----------------------|-----|
| 46 | 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关于章太炎的学术品格) | 陈平原 |
| 53 | 高尚的帕累托佳境 | 盛 洪 |
| 61 | 法律之文化观 | 梁治平 |
| 68 | 文字比石头更加不朽 | 施康强 |
| 74 | 人如其乐吗？(瓦格纳杂曲) | 辛丰年 |
| 81 | 话说李嬷嬷 | 刘心武 |
-
- | | | |
|----|-------------|-----|
| 88 | 谁主沉浮？(域外读书) | 桑 晔 |
|----|-------------|-----|
-

91 品书录

“低回忍说识君迟”(谷林)——充满矛盾的周作人(铁荣)
——“鹅妈妈”三百年(倪维中)——“座”而论“道”(大东)
——遗憾的《索引》(黄英)——“杂语”中的真实(鲁冀)

102 一句话书评

“五马分尸”(李若愚)——“不尚贤……”(汪丁丁)——“沧浪之水……”(刘增荣)

110 文章作法

朱 正

114 “闲话”和“后话”

吴福辉

121 儒家：民主的最后障碍？

亦 陶

130 从儒家个体论到新人欲说

冯克利

138 阿特伍德新作(西书拾锦)

冯亦代

141 作家和文抄公(远眺巴黎)

吴岳添

146 文求堂与《羽陵馀蟾》

陈福康

150 读书献疑

更上层楼(缪哲)——关于《函警记》(劳祖德)

154 漫 画

丁 聪

155 新书录

159 《读书》栏目介绍

读书短札

提了一句的(石晓, 9)——书讯(田文, 45)——更正与补充
(姚尧, 67)——古书断句(金克木, 73)——此周非彼周(宜
生, 90)——蓬屋说诗(凡木, 109)

理性透视下的人格

李辉

无休止的辩解或者辩诬，一次次的自责和愧疚，乃至悔恨，这些折磨心灵折磨精神的形态，自从开始文学生涯之后，几乎一直是巴金人生风景中必不可少甚至最为丰富的内容。时至晚年，他在《随想录》中，将这些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得如此动人如此深厚。有思考，便有痛苦，有痛苦，便有升华。他的精神正是在完成了这些表述之后，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人们对他的敬重，不仅仅因为他的《家》，他的《寒夜》，他的《随想录》，而是在于他的整个人格，一个由作品由人品由思想由道德构成的完整世界。这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但的确是一个真实的人格。而在我看来，生活中，真实比完美更为可爱。对于一个传记作者，巴金这样一个人物，显然是一个有着巨大诱惑的传主选择。研究他，解说他，描绘他的生命景象，会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充实，对自己学识和才能的一种考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会是自己人格的一次超越。

陈思和选择了巴金。他说他要“写出一个独特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

在我的感觉中，这些年活跃于文坛的青年评论家中，陈思和的文章，常常透出一种厚重。这种厚重，在于扎实的理论和史料功底，在于他的冷静而透彻的思辨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朴实而严谨的文风。在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视为一体予以论说中，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他都表现出这种做学问而需要的且甚为难得的厚重。

当他告诉我他要写一本巴金的传记时，我便相信，从他的手中出来的，不会是一片轻飘的云，更

不会是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为传主高唱颂歌的虚饰之作，或者事无巨细地转述传主的回忆，而没有作者本人对历史对传主的理性透射和真实解剖。

在我看来，一个传记作者，选定一位传主后，确定一种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追求一种什么样风格，会受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文风的影响。换一句话说，他得根据自己业已形成的思想和文学风格，找到与传主的生命相契合的最佳表现方式。一个传主当然会有不同的传记，这种不同便是因为每一个传记作者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人们谈到一本传记的成功与否，常常强调的是它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传主的真实。这话自然没错，真实应该是追求的目标。问题是，对“真实”会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解释。就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一旦他进入传记领域，他的“真实”，永远不会是绝对的、全面的。拿破仑、华盛顿、莎士比亚、哥德、鲁迅、毛泽东，在任何一本传记中，不可能是他本人的唯一的真实。这种真实，只能是传记作者在各自的创作过程中，受其思想深度、感悟能力和文学才气的限制而认识到的、表现出的那一个“真实”。

陈思和决定创作巴金传时，显然也感到了这种困惑，所以他没有不切实际地自认为能超越所有人，写出巴金唯一的真实。他在“小引：作者的独白”中的这些话讲得十分好：“任何人都回天乏术，无法用文字来‘重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真实，即使是作家本人吧，他一生写下了数百万言的文字，多多少少留下了生命在流逝过程中的一点真实，他的回忆录，谈话纪要，又多多少少表达出对本人历史的一种解释。然而，作为历史文献背后的文化语码，因为时代久远，当代人又能体味到几分真实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一本传记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传记作者选择好一个适合于他去表现的对象，并能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优势，使传主的生命在他的主观观照下，得到充分的阐释。跌宕起伏的传奇性，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或者曲曲折折的思想发展，以哪一方面为其侧重点，并不重要；小说的生动性，富有

诗意的大写意，冷静透彻的扫描，彼此也没有谁高谁低之分。关键在于他必须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在他勾画传主形象的那些日子里，将自己的生命楔入传主的生命，真实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浅薄和虚假，决不会产生深刻和真实。一个传记作者，当他真实地解说一个生命的时候，他也就完成了一部真实的传记。

“我不敢说，我在本书中刻画出一个真实的巴金的形象，但我力图真实地写出我对巴金的全部思考、理解和困惑，我愿意写出我为什么无法完成一部真实巴金的传记的困难和缘故，也展示出巴金研究现状的各种盲点和空白。”陈思和说得非常坦率。

坦率往往意味着老实。老实，便是陈思和做人和做学问所追求的风格，何况他所阐释的，本是一个真诚的生命。

从阅读来看，这部传记当然不属于那种可读性很强的作品，没有故事，更没有传奇，即使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爱情婚姻，其描述也微乎其微。作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他注重于理性的分析，使其成为一个人格发展的记录，而非一般性的故事演绎。另一方面，这也是受传主的特点所限制。和同时代的很多作家相比，如郭沫若、茅盾、徐志摩、丁玲、沈从文、萧乾等，巴金的生活道路，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更没有什么传奇性。他的感情生活，就人们目前的了解而言，也没有多少可以构成故事的情节。他本人，尽管以生动的笔描写过许许多多男男女女的爱情故事，可是对自己这方面的回忆，几乎是一片空白。他的爱情婚姻，对自己人格的发展起到过什么影响，也从未谈及。对于想创作一部生动的文学性极强的《巴金传》的作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作者目前采取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贴近传主特点的选择（这当然不意味着排除存在着其它描述方法的可能性）。在整个作品中，他好像更愿意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分出现，让自己的影子，不时闪动在读者眼前。看来作者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他要读者同他一样保持一种冷静，随着他的思路去分析巴金。

作为一个冷静的富有理性的传记作者，陈思和是站在与传主平等的位置上来从事他的解说的。《家》的巨大影响，已经使一代代读者，有意无意之间将作品中的高家，视为巴金的家本身。而巴金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回忆录中，也几乎将自己所生活过的环境，描述得真似一个专制的封建王国。陈思和在考证、分析、描述之后，认为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被视为专制代表的爷爷，却应该属于比较开明的老人。他认为，巴金在回忆童年生活时，的确有“小题大做”的成分，巴金之所以依据一个并非专制罪恶的家庭创作出强烈反封建的《家》，则是巴金三十年代已经形成的思想决定的。“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他的这一结论，新颖而独到。

对这个家庭的真实分析，对于如何理解巴金人格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生活在一个并非特别封建更谈不上专制的家庭中的巴金，为什么在十五岁的年纪会那么如醉如痴地喜爱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进而全身热情为它而燃烧？这只能说明，巴金不是一个一般的少年，理想对于他，远比现实更为重要。也可以说，理想主义色彩，从他的人格开始形成的时候，便成了他的生命的基调。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作者的笔下，巴金的人格发展，被概述为“胚胎——形成——高扬——分裂——平实——沉沦——复苏”这样一个时序的人生大循环。目前完成的这本传记，是这个循环中的前五部分。他很坦率地承认，他“现在只能指出这一人性大循环的可能与意义，却无力把它完整地勾勒出来”。然而，他已经明确地阐明：“没有后来的沉沦就没有最后的复苏，没有最后的复苏也就无法照亮以前各个环节的意义，巴金的人格发展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我们称巴金是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正是因为有了他晚年灵魂的复苏和再度高扬，有了那煌煌一百五十万言的《随想录》作为见证。”这是作者给予我们的提纲挈领的启示，他尽可能地描述出

了一个理想者的人格历程。

在已有的叙述中，解剖“分裂”环节的一章“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唤”，也许是作者描述得最为透彻最为酣畅的部分。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在经历过热情的燃烧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之后，已经不可避免地在现实面前痛苦地看着自己理想的太阳陨落。曾经有过的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抱负，立在实际政治活动面前的徘徊，都是导致他的人格分裂的压力。从气质上说，他的自幼形成的忧郁性，他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恰恰内在决定了他在感到理想失落的痛苦时，被动地选择了文学作为发泄痛苦和困惑的手段。人格的分裂，反而导致他在文学的成功。生命中这轮新的太阳的升起，却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另一轮太阳陨落的代价。这便是巴金面临人格分裂时的痛苦。用作者的话说，巴金当年蜚声文坛，成为青年的偶像，这种在文学上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

作者所透视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分裂的人格现象：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

我很欣赏作者在解剖巴金的人格分裂时，注意到巴金对道德的重视。道德，这绝对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可以不断地为所有人谈论的话题。

当无可奈何地看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消亡，感受到这种寂寞时，巴金将道德人格作为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追求确立在心中。他向弟弟推荐他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将克氏的一生，称为“一个道德发展的人格之典型”。他甚至这样说：你可以反对或者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但你一定要像全世界的人一样，赞美他的人格，承认他是一个最纯洁最伟大的人，要拿他做一个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这样的话，你的一生才不会有一刻良心的痛悔，不会有对己对人不忠之事。

从巴金最初热中于社会活动的理想来看，这些话显然隐含着他的某种伤感。但是，从做人来看，他的这种清醒的对道德的意识，对道德的强调，正是使他的整个人格的发展，使他的人性大

循环，有了一条主线。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他就是以他所赞美的模式来限定、来发展他的人格，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有着丰富人生阅历复杂感情体验的人，不会简单到按一种固定的格式来确定其人生道路。但是，这种对道德的推崇，却必然要影响他对人格的一种理想的内在选择。

作者尚未叙述的“复苏”环节，依我看，正是巴金道德人格的复苏。他对文革、反右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思考，他对自己的解剖，确切地说，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飞跃。《随想录》中，那个痛苦的巴金，自然不同于“分裂”环节的巴金，他主要是在做自己灵魂的剖析，而这把手术刀，便是道德。他所做的忏悔，他所发出的呼吁，大多数与他所感到的良心自责有关。他之所以反复鞭挞自己的灵魂，我想就是因为当他重新审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那些举动，同他当年为自己确立的道德人格的标准，有着明显的差距。正义、互助、自我牺牲，他在二十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伦理学》时所信奉的做人的原则，早已消灭的无影无踪，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并没有做到用它们来约束他如何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动去写检讨，去讲假话，去批判人，包括他所熟悉的友人。这便是《随想录》中巴金的痛苦。这便是为什么他那样严厉地甚至有些苛刻地解剖自己，那样反复地强调讲真话的原因。没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对道德人格没有如此强调的人，纵然有过他同样的经历，或者比他更应忏悔，也不会写出他这样的作品来。正是在这些反思中，在这些真诚的文字中，他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一个整体，他才完成了本书作者所概述的由胚胎到复苏的这样一个大循环。

道德过去曾一度被视为虚伪的东西批判过，也有文章认为《随想录》只是停留在对文革的道德反思的层面而怀疑其价值。但是，巴金却是在真诚地拥抱着道德。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准则。自然，真话不意味真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不同范畴的问题。真理属于认识论，真话则属于道德观。真话虽然不一定代表真理，而

假话却万万不会是真理，而且只有前者才是探索真理的途径。戈培尔说过“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事实”，从历史上看，这已成为对法西斯本身的嘲弄，从道德上讲，这显然也是做人之大忌。尽管陈思和尚未对“沉沦”“复苏”环节的巴金展开论述，但他提出的巴金对道德的重视，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文人间各种表现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给人们、特别是文人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同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

提了一句的

石 晓

看过舒芜先生《致友人》（《读书》今年第二期，颇有启发，又取出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略读一过。中国抗日战争，在书里还不是“一字没有提到”。序言里说到，为他生活的时代作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他说：“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如果炸弹在上海摧毁房屋，在受伤的人尚未被抬出他们的房屋以前，我们在欧洲的自己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他虽然到过印度及东南亚几个城市，却没有到过中国。只是侧面提了一句日本的侵略。他的一生，是和被涂炭

的欧洲生灵及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他诚然对和平抱着幻想，但他毕竟很具体生动地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支“领导得非常好”的“小小的冲锋队”如何威慑着工人，“勇敢的年轻人对它产生狂热的崇拜”。是如舒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学生、老太太，都能把希特勒同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看”。不过，茨威格的笔没有高谈中国抗日战争，就是他的“局限”么？我是个爱书者，多么盼望懂得了怎样认识世界的前辈作家，给人们写一部散文作品，讲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桃子怎样被摘取，又怎样在腐烂？突破《昨日的世界》的“局限”，不但可作为这类书的续编，且可稍稍抚慰屈死的茨威格伫立在泉下的灵魂。

见血见肉，方为真实

蓝棣之

沙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二级作家，但这不等于说《沙汀传》的价值就一定得在二等以下。这得要看怎样发掘，怎样叙述，是否真下功夫，尤其是要看是否敢于触及见血见肉的真实。吴福辉的《沙汀传》是一本对沙汀有深刻理解的坦白、真实的书。传记还描绘了与沙汀有过交往的几十位现当代重要作家的风貌性格，展示了一部活的流动的现当代文学史，而且借助对沙汀及其周围人行为的分析，探讨了四川人的性格特征，或许可以说，它描述和研究了中国内地所特有的茶馆文化、袍哥社会、乡镇传奇与四川民俗，的确为传记写作进行了新的探索。

沙汀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和活动家，但他来自旧的世界，舅父、岳父均为本县大袍哥。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革命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世的天性。沙汀初闯文学之门时，正值左联初期普罗文学成为主潮，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要求写都市的集会、罢工，农村的反抗、起义，他对此感到迷惑与无所适从。这时他与艾芜一起联名向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对他们的训词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沙汀当时很难全部领会这话的复杂涵义，接着又因鲁迅对他一篇作品所下“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断语，阴差阳错，在创作的道路上经历坎坷。直到一九三六年，三十四岁的沙汀，才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他的创作才算有了落脚点。《在祠堂里》等短篇小说形成影响的秘密在于：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沙汀这个期间偏于题

材传奇性的审美情趣相一致。在这之后，他的创作开始大规模地概括故乡。在经过了太久的滞留之后，在艺术风格的成熟阶段，沙汀于四十年代写出了他的重头作品、长篇小说《淘金记》等“三记”，全力采纳乡土讽刺故事范型，实现了用现代形式表现乡土的文学理想。

从《沙汀传》这本书的描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真正的文学创作，实在只能是一种体验。沙汀三十年代后期，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改变旧的创作基地，另辟新路，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的期望，奔赴延安。这个想法是在读了友人周立波发表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之后萌生的。到延安后，他被贺龙那种有力量的性格迷住了。为了追随贺龙那光彩的性格，他跟随贺龙到了抗日的最前线。奇怪的是，他一门心思去前方，到了前方却在写后方。他置身于抗日根据地，但他不敢这么快便拿敌后题材写小说；在对贺龙追踪访问的间隙，他写的却是关于偏僻的抗战大后方的讽刺小说。他醉心的仍是描写农村人物，他的创作中心所在，是用前方的感受，来加深对后方的认识，他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了故乡。从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他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在文艺思想上，他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例如“旧瓶装新酒”等）不合。但这些想法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这在沙汀的内心是很苦的。他终于决定还是离开延安，回到四川。他好像是回头走去，但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时代。然而，这次离开延安的原因，成了解放后他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他得证明自己不是临阵脱逃，还要设法不致被人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作为延安之行的收获，他写成了《H将军在前线》，描绘了贺龙阔大不羁的蓬勃性格。然而，沙汀之所以能写好贺龙，也是因为他能体验贺龙，而不仅仅是观察与记录贺龙。沙汀意识到贺龙是一个从农民群众中站起来的领袖，他把贺龙归入他的乡土世界里的一个新人。他认识到，从旧世界中走出了贺龙，也走出了自己，从而在贺龙与他之间，找到了内在的连结点。

传记以真实和多方面的材料，展开了对于沙汀创作的种种评价的讨论，给人的启发是很多的。尽管沙汀是左翼作家与活动家，但他的作品并不直接反映革命斗争，歌颂革命英雄，而多为暴露与讽刺；他的作品并不是大众化的，不是旧瓶装新酒，他所谓的现代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几分“欧化”的；在艺术上他含而不露，一刀是一刀，下笔有余味，但也就有些不够明快。沙汀也与任何一位作家一样，都生活、创作于一定的时空之内，都有难以完全摆脱的某些局限。这些都给对他的评价带来困难，也常常使他自己陷入惶惑。这一切，传记都真实地展示出来了，使人不能不深深地思考个中的道理。四十年代后期，胡风主办的《希望》以及《泥土》两个杂志，认为沙汀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是“客观主义”，思想力不够，缺乏更深更热情的探求。沙汀对此十分恼火，认为那些是惊人地武断的批评，曲解了他不动声色的风格。但他承认他的作品对“人”开掘不深，而且认为这是由于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沙汀的反思是很有度量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严文井、胡乔木对于沙汀创作的评价，使他兴奋和惶惑。他们说《淘金记》是对“地狱”的出色描写，是地方风俗史，说沙汀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他们认为沙汀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普通读者对于那太含蓄的用意，理解起来很吃力，甚至认为沙汀作品里的劳动人民形象给人的印象不鲜明，容易与反动人物混同起来。他们觉得沙汀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沙汀反复思量这些话，他总是想不明白。这些话里肯定有很重要的启示，但他弄不懂为什么对丑的调侃只能是一种色调，表面不太刻毒的社会讽刺，为什么就不可以。在此之前，他一直很欣赏赫尔岑在评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时写下的一段话：反对农奴制度，可以像屠格涅夫那样不过甚其辞，也不必驱遣过猛的语句，只需优美的文体，平心静气的叙述。沙汀甚至把这当作不懈的美学追求。他知道他的讽刺笔法在今天已无用武之地，他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八十多岁高龄的沙

汀晚年回顾这个关于讽刺思想的问题时，不无惋惜地认为：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他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赵萎缩。作家的创作思想在萎缩，而不是更有朝气这是非常可悲的。由于传记中的这些内容，我不能不认为，吴福辉写这部《沙汀传》，似乎兼有总结现当代文学经验与教训的目标。

传记对于沙汀创作个性的刻划，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沙汀那种对于文学的执着追求与投入的态度，不但使人感动，而且颇有感触。沙汀只是对写作有兴趣，入迷，在他生命的任何时期，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当官。朋友们的成就带给他巨大压力，但他从不粗制滥造。他决不因约稿信纷至而草率写作。四十年代整整十年，沙汀都处在半囚禁生活的窒息下。他说那十年时间他不能体验到完整的生命，但写作的生命却燃烧得更旺。这是因为他把生命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这种创作个性可以称为“土拨鼠”方式：土拨鼠的视觉是环境毁掉的，并不是它自己甘愿的。它手足锋利，能够遁土打洞，不停地挖泥巴，这不单是为了藏身，储存食物，倒更多的是为了透一点阳光。沙汀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的山里人习惯。“土拨鼠”式的创作方式给沙汀作品带来体验的深度和厚度，使他的作品含蓄耐读，经得起解释与回味。沙汀作品的广度是从深度获得的，“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

作者在传记中创造了一种“对讲”式历史传记结构。这是一种以开放性、阐释性、接受性为特征的结构。他认为历史再也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重述出来，而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运用原初与第一手材料，却也无可奈何地带着传记作者的印记与体验，并由此切入历史。他认为传记是记录，诉说，写照，但也不免会有传主与传记作者的交流与撞击。因此，传记必然地是彼此进行的一场关于“那个人”的历史性对话。他通过这样的“对讲”，追求当代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既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自己“平等”地阐释他们。从“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作者大量采用了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

的口头材料。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沙汀不顾年老多病，与作者有过几十个小时的录音谈话，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还允许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在这个过程中，沙汀以置身于一切现实是非与矛盾之外的文坛前辈的身份，对自己八十多年的经历作了最直率、最坦白、最不顾忌的陈述，丝毫不吞吞吐吐，也不左顾右盼，真可谓是超越了时空纷争的老人的坦荡自白。在传记的“对讲”结构里，自然处处都渗透了传记作者的观点，这观点不仅鲜明地表现在贯穿到底的同时又是虚拟的传主与传记作者的对话里，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当事人所口述的话里，因为这些材料都经过了传记作者的头脑和记录，已经包含了主客双方。在这些地方，吴福辉表现了对沙汀全部作品的理解，和对沙汀人生历程的独到阐释，以及对现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们的深刻认识。然而，传记作者的观点又并非传记的终极观点或最高观点。对于诸多问题的叙述、理解与阐释，传记保持了多元视角，把结论留给读者去作出。这样，“对讲”结构就带来了写作与阅读的民主化，读者不必担心成为别人武断结论的奴隶。

面对这样一本显然有感情与心理含义的传记，我曾经当面问作者他的写作动因。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本学者写的作家传记，作者在这里显然是体验了什么，投入了些什么情感，不察觉地在寻找什么答案。这些问题绝不是评论一部传记时的百无聊赖的节外生枝，相反，它恰恰是写好一本传记或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在条件。吴福辉说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沙汀，他只能回答：因为他爱读沙汀。可是，为什么爱读沙汀呢？他说沙汀吸引他，是沙汀关注现世的世态人情，是他的小说厚重有力而非感情外溢的风格。沙汀不是才子，但他是那个乡镇世界的智者，有一支能雕镂面前的各样人物的笔，最能领悟奇奇特特的性格之美，尤其是“丑美”。沙汀的作品里没有感伤气息，书生气，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在生活中，他是有情的，他甚至因为感情牵挂，为朋友、为孩子作出牺牲。总之，吴福辉说沙汀现实地生活过、创造过、眷恋过了，他说他神往于这个。对于“现